



農圃道孕育了一班社會精英

# 驕傲與悲哀



新亞研究所所長陳志誠不擔心新亞精神消失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香港近年真是人心虛怯。於是常呼「這是香港人的驕傲」，卻不知「驕傲」原是一個貶詞。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全國知名的大師級人馬，紛紛流落香港。如果我們說錢穆、唐君毅曾長時間任教香港，是香港的光榮，其實無異於說明了整件事背後所透出的中國的悲涼。

當我拿着「桂林街新亞舊址要面臨清拆」、「新亞研究所將來會否結束」等問題，問新亞研究所所長陳志誠時，他表現出內斂的平淡。他說：「不一定是新亞人才能擁有新亞精神，新亞精神著重對學問、對人真誠，這些東西不會突然間完全消失。」他又說：「如果新亞研究所將來結束，個人是有點可惜，但如果使命完成，不存在也沒有問題，不是沒有了新亞，就代表沒有了新亞精神。」

目前新亞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只有幾個人，教授的數目可能比學生多。陳志誠說新亞研究所最寶貴的是圖書館，藏書十三萬冊，集中於文史哲，而且有

不少是絕版線裝書，藏書量比一些專上院校還要多。學校門口的字是唐君毅夫人謝廷光寫的，校園有一棵樹是錢穆親手種植的，還有錢穆的銅像和對聯。

根據黃祖植去年出版的《桂林街的新亞書院》透露，1956年新亞書院初遷農圃道，當時有一鐵函，埋在圖書館位置的地下，內藏全國及香港地圖各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面、《四書》《五經》《新約全書》《新亞概況》、當天中英文報紙各一份、本港貨幣，以及一份新亞師生題名錄。滄海桑田，當年印上「中華民國四十五年」的報紙早就成了歷史陳迹，台灣由主張台獨的政黨執政，香港英皇頭像的硬幣變成洋紫荊圖案，在香港掛的國旗是五星紅旗，維港幾乎被泥土填滿……

新亞書院校歌有這樣一句：「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當初錢穆、唐君毅等人創辦新亞，確是「手空空，無一物」，到後來新亞獲政府資助，更併入中文大學，兩手早就不空空了。但一九六四年，創辦人錢穆倒要離開了。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曾撰文指，新亞圖書館館長沈燕謀曾屢催錢穆寫碑記，勒石留念，但錢婉辭不肯。



蘇東坡有一首詩說：「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講蘇東坡遊故地，發現世事無常，自己過去題詩的牆已然毀壞。錢穆一九六四年辭職，他在農圃道向同學演講，說自己「本無舊題，何來壁壞？」「將來新亞遷至馬料水，我和新亞，便漸成為了無關係。」錢穆又說：「若我個人真和新亞書院分不開，則是我辦理新亞規劃之不當。」

### 忍痛參加 進入建制

據新亞校友講，當初港府建議新亞併入中文大學，大部分新亞校董表示反對，反對最力的是董事長趙冰，新亞入中大後，趙冰再沒有出現在新亞。事實上雖大部分同學想參加，但也有少數「頑固」的學生反對，理由同大部分校董一樣，怕新亞獨有的辦學精神從此消失。後來在錢穆和唐君毅主張下，新亞併入中大，他們的理由是為了學生有更好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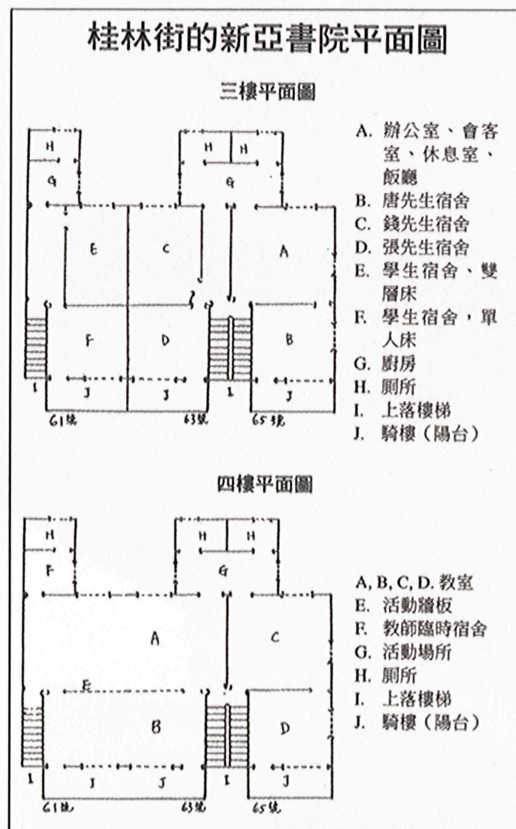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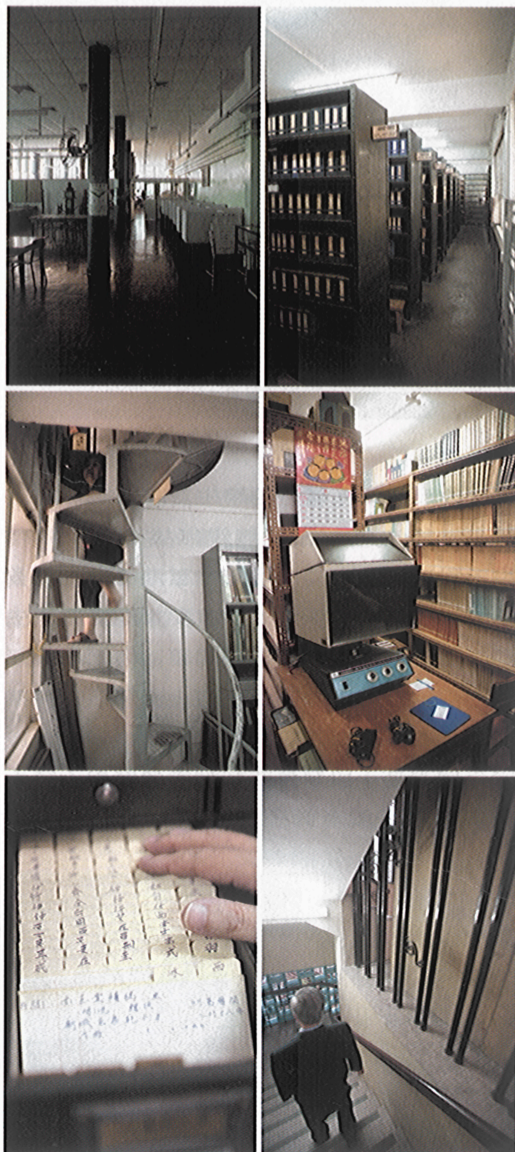
當代著名哲學學者蔡仁厚形容唐君毅是「忍痛參加」。唐先生當時提出聯合制，行政與教學獨立，三院各自獨立運作(另兩院是崇基和聯合)，以維持各書院特有精神風格。蔡仁厚說，後來因聯合書院董事為香港紳士，即高等華人，多聽命港府，而崇基書院志在傳教，傳揚中華文化與之沒有所謂；於是在香港政府的策劃下，校政會議，一律說英文，終於在第二年氣走了新亞校長錢穆，張丕介亦憂傷成疾。徐復觀說：「新亞是靠錢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之理想、張丕介先生之頑強精神而支持的。」一九七四年唐君毅和牟宗三退休，一年後港府強行統一三個書院，新亞書院的董事憤而辭職。

記者採訪多位新亞老畢業生，很少有人說「新亞精神已經消失」，他們會換個說法指「中文大學的新亞是在建制內發展新亞精神」。唯有黃祖植坦率地說：「新亞精神，最光輝是最初十年，現在已經沒有了。」記者問他為什麼沒有了呢？他答：「因為多了錢呀……」



新亞研究所的圖書館是一座寶庫

# 地小氣壯 士少人強



一九四九年，新亞前身的亞洲文商專科校成立，首先設於佐敦道碼頭附近偉晴街華南中學三樓，一九五〇年，遷至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號，易名新亞書院。新亞書院佔三樓和四樓共六個單位，四樓上課用，約一千呎，間成四個課室，其中兩個可移去活動牆板，作為周日公開講座之用，除錢穆、唐君毅外，羅香林和當時四十餘歲的饒宗頤也是主講者。三樓亦佔一千呎，分成六個部分，每個部分約一百五十呎，前廳(附陽台，朝東南)分別是唐君毅夫婦的房間，張丕介夫婦的房間，和其中一間學生宿舍(六張單人牀)，後廳分別是辦公室與飯廳的綜合用途室，錢穆的宿舍(朝西北)和另一間學生宿舍(四張碌架牀)。

當時學生約五十人，與老師於斗室內同吃同睡，錢穆從別校兼課回來較晚，因學生宿位不足，部分學生睡在樓梯處，錢穆往往要跨過學生身軀，才能回自己房間。

一九五一年，新亞資金緊絀，錢穆到台灣籌錢，見蔣介石與蔣經國皆吃配給米，不好意思開口取資助，經人轉達後蔣介石願從總統府辦公費項目下省出港幣三千元相助。當時專任教授只有二百餘元薪水，比普通工人還低薪。情況至一九五四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基金資助才有改善，五六年新亞遷入土瓜灣農圃道。後來港府有見於開辦一所以中文為主的大學讓平民子弟入讀可培育更多精英配合社會發展需要，新亞遂得港府資助，六三年再合併入新設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教授待遇自然大幅提高，同學將來職業出路也更有保障。

不過，對老校友來，倒是最窮最吃苦的桂林街時代，最值得懷念。

(按：一九六四年錢穆辭職離開中文大學，七五年新亞書院再不能行政教學獨立，新亞九名董事集體憤然辭職。新亞研究所一早不接受港府資助，而且不被港府承認，一直位於農圃道。)